

走向主体间对话的翻译研究

——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路线的哲学诠释学反思

陈宋洪

(莆田学院 外语系,福建 莆田 351100)

摘 要: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路线与“等值”理论在传统翻译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鉴于传统理论对语言规律的过分倚重,译者的主体性被严重束缚。哲学诠释学思想冲破了传统理论的制约,通过视域融合、主体间对话构建了新意义观的基础。在发展的视域、历史的对话中,诠释的多元得到认同,译者的主体性获得彻底解放。哲学诠释学理论驳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展示了翻译主体诠释的永恒魅力,由此开启了翻译主体间对话的研究模式。

关键词:结构主义;翻译;哲学诠释学;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1)01-0105-04

翻译本质上是涉及意义理解与表达的双向性过程,不管何种类型的翻译,译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诠释始终不可或缺。因此,从翻译的性质而言,翻译即是诠释^[1]。然而,在传统翻译研究中,与主体诠释密切相关的诠释学理论始终未受充分的重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从古代奥古斯丁延伸至 20 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路线^[2]。传统翻译思想以主客体二元对立认识论为主导,认为只有正确分析语言内部结构,成功发掘原作者的创作意图才是取得唯一正确理解的途径。

不可否认,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路线开启了翻译科学性、系统性研究的进程,但其理论本身对译者主体性的长期忽视也始终制约着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哲学诠释学通过对诠释及诠释主体的深刻反思,以主体间对话模式消解了二元对立与传统意义观的理论基础,推动了翻译研究从文本中心论走向了主体间性对话的研究模式。

一、结构主义思潮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路线

(一)结构主义与“等值”理论的影响

结构主义思想源自 20 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推动下,这一思想逐渐在欧陆兴起。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源于语言学。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以结构为基础分析语言,提出整体性、共时性等具有普遍

意义的结构主义理论,推动了结构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在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翻译学研究也走上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路线。在结构主义的视域中,语言本身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共性论占据核心地位。由此看来,作为语言间转化的翻译在本质上就是在不同的语言间寻求等值的过程,而如何实现语言整体结构上的等值就成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路线的中心话题。

早在 1953 年,费道罗夫在《翻译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等值思想,强调翻译就是在表现原文思想内容上的完全准确,并在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完全一致。随着结构主义影响的扩大,等值理论研究随之蓬勃兴起,其代表人物包括了雅各布森、纽马克、卡特福特与奈达等著名翻译理论家,而等值仍是构成他们思想的核心。雅各布森认为“在不同的语符中求得对等是语言的主要问题,也是语言学的主要问题。”^[3]卡特福德则将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语言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两种语言只要具有空间的,时间的,社会的或其他的,都可以建立翻译等值关系^[4]。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原则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更是将等值思想推向顶峰。

等值理论同样对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翻译史上,最为人所知的翻译原则就是严

收稿日期:2010-07-29

作者简介:陈宋洪(1980-),男,福建莆田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其中作为三原则基础的“信”即严格忠实于原文。林语堂也提出过相似的见解“翻译第一是忠实的标准,第二是通顺的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9]翻译家金隄则指出翻译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即把一个原来用甲语言表达的信息改用乙语言表达,使不懂甲语言的人也获得同样的信息^[9]。不难看出这些思想本质上都与“等值”理论存在相通之处。综上所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路线的影响下,中外学者都力求在翻译中实现语言等值转换,强调译文要完整传递原文思想,并保证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路线的影响

结构主义思想赋予翻译研究理性思维,并通过语言结构分析使翻译摆脱了早期仅依赖主观直觉的研究模式。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研究者将翻译视为一门科学,强调在字、词、句、段的翻译中,发掘翻译规律,力图将翻译发展成为一项有章可循的活动^[7]。这从根本上反映了对翻译的深层理论思考,也促进了翻译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虽然结构主义为人类认识语言系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但由于结构主义的封闭性和隔离现实,研究者往往过分依赖语言的规律性,强调只要遵循语言规律,制定出语言转换的规则,就可以做好翻译,甚至机器都可以代替人^[8]。因此,从结构主义看来,翻译仅仅是一种机械式的语言转换过程,人的主体性因素则被完全忽视。而丧失了主体性的译者恰似一台没有思想的翻译机器,这种思想极大限制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阻碍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哲学诠释学对结构主义翻译观的消解

鉴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路线的诸多不足,翻译研究者逐渐对这一理论模式提出批评与挑战,并试图突破这一结构,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构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反逻各斯中心、延异、替补、互文性等一系列新概念的提出冲破了以结构主义为中心的封闭与僵化。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哲学诠释学应运而生。诠释学是一门以研究理解与诠释为中心的传统学科,由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引入哲学领域,并建立起方法论诠释学。进入20世纪后,随着以科学主义为中心的传统认知方式的消亡,当代诠释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提出了“此在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并完成了诠释学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哲学诠释学思想体现了对主体的尊重与思考,它以

一个全新的视角消解了结构主义的负面影响,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

(一)对话与传统意义观的消解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意义是由语言规律决定。任何语言都具有普遍的表达力,语言转换的基础在于语言共性论。文本的原意是意义的中心。甚至传统的诠释学理论也认为一切理解与解释,都必须彻底清除诠释主体的主观性,才能实现对原意的客观诠释。例如,方法论诠释学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就主张在诠释中读者应通过“心理移情”的方式,重建文本与它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即把诠释视为主观地重建客观过程^[9]。在这些传统意义观的指引下,意义的决定性力量就在于作品中蕴含的不以理解主体意志为转移、且客观存在的“作者原意”。翻译的本质也就成了译者对原意不懈追求的过程。

这种传统意义观在哲学诠释学中得到彻底的改变。新意义观的基础在于现象学中的“存在本体论”思想。虽然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是本体论变革的倡导者与当代诠释学理论的奠基者,但是其思想方法来自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胡塞尔通过意向性学说和现象学还原方法,开启了本体论反思的先河^[10]。海德格尔进一步变革现象学中对于“自在之物”的思考,完成了影响深远的本体论变革^[11]。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将语言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他认为语言并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们生存其间的世界。通过语言的中介,人与世界相互联结,构成世界的整体性。基于此基础上的哲学诠释学带来了认识论的根本性变革。在传统的认识模式中,认识仅是主体向客体的单向运动过程,而哲学诠释学的视域中,主体的认识则演化成更为丰富的主体与被理解对象之间互动的对话性过程。

(二)视域融合与“等值”独白话语的结束

理解与诠释的过程始于诠释主体的生活经验、知识传统、文化意识、道德伦理等各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在哲学诠释学中总称为“前理解”,并被视为理解与诠释的基础。在一般诠释学向主体诠释学转换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就提出理解是作为“此在”的人基于“前理解”对存在的理解。在特定的语言与文化氛围影响下,诠释者的“前理解”往往是稳定而有限的。同样,对文本的理解与诠释在也必然有限,这形成了理解的历史性。

然而,在现代诠释学的视域中,这种历史性的稳定与有限是相对的。诠释的主体与客体都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历史的变迁,语言的发展,不同

历史时期诠释者的“前结构”必然各不相同。每一个时代的诠释者都会基于不同的“前理解”来理解历史,同样不同时代都将赋予同一文本不同的诠释。在诠释者与文本的历史对话中,文本意义的多元也就相应成为了可能。就如哲学诠释学中所强调的那样,文本的意义“由诠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12]。这种理解者与理解对象在历史发展中融合一体的“效果历史”构成了诠释的发展性与无限性。在哲学诠释学的视域中,文本是开放的,对话是历史的,意义是多元的。于是,文本意义的独白话语时代也被彻底颠覆。

同样,在翻译的过程中,无论是原作者的意图还是译者的“前理解”都不能被轻易抹杀,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为二者提供了对话的平台。视域本身以“前理解”为基础,并具有发展与开放的特点。伽达默尔认为意义的理解应是新的视域和旧的视域不断在活生生的价值中汇合的过程,这二者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被明确地去处掉^[12]。此外,视域本身的开放性更赋予了“视域融合”发展的动力。在历史发展的视域中,文本的意义是开放且无限。文本理解活动在本质上是不同视域的相遇,不同视域的差异性恰恰是导致对自身界限的跨越而向对方开放^[13]。

基于哲学诠释学基础上的意义观与翻译研究对“等值”独白话语构成了否定力量。在翻译中,译者的视域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视域又不断融合出新的意义。这样,作者的“原意”已不复存在,对“原意”的孜孜以求也彻底失去意义。

(三)主体间对话与译论的发展

“人类的理解在本质上是语言的,而语言的存在方式就是对话,语言总是在对话中进行的。”^[14]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意义观正是对话的集中体现。在这种对话中表现出来的意义不仅仅是属于诠释者的,或是诠释对象的,而是共有的、历史的。在通过视域融合构建起主体间对话的同时,现代诠释学还将历史的概念引入意义的形成之中,从而进一步论证了文本并非封闭而自明的系统,文本的真正意义应在于历史的视域融合之中。

在翻译研究中,语言的意义蕴含在从主体的对象化(由作者写出文本)再到对象的主体化(译者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中^[15],是译者通过文本为中介与作者对话的产物。在通常情况下,作者完成作品之后就引退了。但是译者所面对的文本并不仅仅是纯粹的文本,更是

蕴含主体性的语言。作品反映作者的思想,传递作者的心声。以此为媒介,译者与作者之间形成了生动的对话与交流。由于历史形成的视域差异,不同的译者通过相同的文本中介就可能与作者之间产生不同的对话与视域融合。有时文本在他们心中激起了共鸣,有时他们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是不论如何,作品的意义总是在这种对话关系中不断被理解、商讨、深化^[16]。也正是由于这种对话的存在,作品本身的意蕴才会不断得到充分的展示,甚至可能超越原文,像法译本《浮士德》竟能得到原作者歌德本人的赞赏,并认为比德文的原文还要好。正是这种主体间对话对于“等值”的超越才成就了这一古今中外翻译史上的佳话。

同时,在翻译实践中,译文的生产并不意味着对话的终结。诠释的主体与客体都始终处于发展的历史之中。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在与不同时代的译者,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译者的不断对话中不断融合出新的意义^[17]。因此,在走向对话的翻译研究中,绝对的“等值”不复存在。在这一发展的主体间对话模式中,翻译才能获得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三、结语

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路线启发了人们对翻译理论的科学思考^[18]，“等值”理论显示了人们对语言规律的深刻理解。然而,在尊重语言规律客观性的同时,翻译中的主体性因素却不能因此被忽略。作者、文本、译者是构建翻译进程的三大要素。对于译者而言,文本意义不应仅仅局限于语言内部结构或者原作者的意图,还应受到自身主体性的影响。译者的主体性存在于历史情境之中。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译者都必须立足“前理解”,以动态发展的视域投入到探寻意义的实践活动中。因此,理解的多元性不可避免,寻求与原文意义“等值”的传统翻译思想也失去了价值。

在哲学诠释学提出的视域融合中,意义生成于不竭的、历史的主体间对话。这种对话始终充满着活力,并赋予语言各种可能性。由此,我们不断在发展的历史中倾听语言、理解语言。恰如海德格尔所言,我们永远在语言的途中^[19]。在哲学诠释学的影响下,翻译研究得以摆脱科学主义的束缚而逐渐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人文主义特征。哲学诠释学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文本意义开放的无限可能、主体间对话的丰富内涵以及主体诠释的永恒魅力。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揭开了翻译主体间对话研究的序幕。

参考文献:

- [1] 王宾.翻译与诠释[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
- [2] 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1.
- [3]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87.
- [4]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00.
- [5] 朱桂成.阐释学与“多向度”翻译标准[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24-28.
- [6] 金隄.等效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8:14.
- [7] 段峰.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50.
- [8] 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中国翻译,2005,(2):3-9.
- [9] 彭启福.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20.
- [10]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35-151.
- [11] 潘德荣.诠释学:从主客体间性到主体间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273-280.
- [1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89-383.
- [13] 陈历明.翻译:作为复调的对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29.
- [14] 章启群.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73.
- [15] 侯彦明.解读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中的三个区分和八种样式[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6-59.
- [16] 吕俊.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75-76.
- [17] 冯克江.目的论关照下的商务翻译[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27-131.
- [18] 王春燕.探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62-65.
- [19]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49.

责任编辑:梁雁

Translation Studies: on the Way to 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 Reconsidering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m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HEN Song-h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m approach and the “Equivalence” theorie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However, due to the over-dependence on linguistic structures and rule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ies are severely limited. With the theories of “Fusion of Horizons” and 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onstructs the new meaning concept. In the developing horizons and historical communications, the diversified interpretations are recognized and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ies are emancipated thoroughly. Th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riticizes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theories, demonstrates the lasting charming of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thus opens a new way to 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structuralism; translatio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inter-subjectivity